

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新发展

□ 肖纯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管党治党，提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追求共产主义是党性的本质特征”等新思想新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强大理论武器。

“追求共产主义是党性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本质特征”。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追求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天经地义。讲党性就要讲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党性的本质特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不脚踏实地完成当前的中心任务，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革命理想高于天。”守住信仰高地，才能守住党纪底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心怀共产主义理想、心有所寄，才能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抵住诱惑，从沉溺于物质享受甚至低级趣味中解放出来。这是党性修养的制高点。一些干部之所以得“软骨病”，就是因为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钙”，逐渐失去精神动力，迷失前进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忘记共产主义理想，就容易成为功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性修养是守住信仰高地与守住底线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还首次提出了判断共产主义理想的四个“能否”标准。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共产主义不是空中楼阁。针对有些党员耻言理想、躲避崇高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这就使党性修养成为看得见、可操作、能效仿的有形标准，成为在言行举止中判断共产党人是否持有理想信念的一面镜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发展。

“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

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从阶级性角度对党性作了大量论述，王稼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则从反对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组织上闹独立性的角度，对党性作了系统的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人把党性同阶级性等同起来，把党性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党性与人民性采取对立的态度，抽象讨论二者的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对立的，要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于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巧妙地处理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强调人民立场是党性的根本立场，这一思想为党员干部从整体上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党性是就党的本质属性而言的，人民性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二者统一于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的人来理解人民性。党性来自阶级性和人民性，是

阶级性和人民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原则。所以，“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的必然选择。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借鉴儒家修养的智慧和品格，首次系统论述了党性修养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从党内政治文化的角度推进思想建党和文化强党，创造性地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把党性教育上升到学科的角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修养理论的新发展。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 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关键靠党性和党纪。而党性的文化源泉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用“固本培元”“精神命脉”“魂”与“根”以及“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等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语言，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性修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在党性教育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坚持知行合一，着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些新论断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党性修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

重视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

党性锻炼，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把党性摆在了更加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强调，“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 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当官要当舞台上端端正正的官，当清官，不要当庸官贪官，被人戳脊梁骨。第一步走错了就不行。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共产党员不能用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党性原则，绝不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在政治原则上，党员干部要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在对待组织决定和任务安排上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同组织讨价还价。

讲党性要处理好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严于律己，既要严格要求自己，又要严格要求自己身边人、枕边人和自家人。这是检验党性强弱的重要试金石。

讲党性要处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党员要讲党性、不搞派性，不搞小圈子和非组织活动，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讲党性要处理好业务职责和党员职责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不能用职业标准代替党性标准，不能重视业务培养、忽视党性修养。“第一身份”和“第一职责”的新论断，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内涵，唤醒了部分党员的党性观念，推动了党的意识的新觉醒。

理论研究

话语出处：2015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学习札记：“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斩钉截铁的话语，重申了中国的基本国策，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念。

说起“开放的大门”，人们自然首先想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大家可能记得，1979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就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这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在美期间，邓小平同美国领导人就发展中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两国签订了有关经济、文化与科技等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文件。邓小平指出：“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邓小平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正是以这样的大气魄，30多年来，中国不断敞开开放大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事实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只有敞开大门，世界才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够走向世界。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政策；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窗口”；之后几年，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基本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内地的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2001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正式成员，我国以体制性开放为特征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标志着以主动布局为特征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升级。回顾30多年的对外开放历程，与深化改革相伴而行，经过上述几轮大开放，我国在全球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开始只是距离世界舞台中心较远的一名“观众”，后来走上舞台成为“配角”，到如今已成为备受瞩目的“主角”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打开了“开放的大门”。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 李辉卫

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这艘巨轮的每一次行进，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得益于开放，更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带来机遇。这种动力和机遇，体现在能够给世界各国以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和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环境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不会慢慢收窄？会不会就此关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的开放大门就像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开开了就关不上了”。这是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互利共赢，志在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习札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 任者春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必须回到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文化的根基和动力。现代化是人们利用现代科技、现代制度、现代法治等手段，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等的建设上，现代化优势尽显，但人们的精神动力、道德慰藉和心灵归属，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解决。由此，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便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这种突出优势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现代化建设协力共进，并逐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至少有这样四重路径：在观物格物上，以道的宇宙观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互促进；在社

会建设上，以安顿人心与制度现代化相得益彰；在国家治理上，以德治精神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在对外交往上，以家国情怀与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支撑。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思维魅力。一方面，道是最高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道文化，文化的使命在传道、明道，人生的意义在悟道、行道。丢掉了道这一范畴，以及与其相关的阴阳、仁、和、天人合一等一套核心理念，就丢掉了中华文化的根和特色，我们就会在现代化建设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

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特别是到了近代，重道轻器的弊端突显，西方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我们还在农业文明上踟蹰。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驭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安顿人心与制度建设的相得益彰。安顿人心，予人以精神家园，这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就是说，只有从世代相传的文化所给予我们的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中，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认同中，我们才能找到支撑精神、安顿己心的基本力量。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制度体

系，提高制度执行能力，而且需要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引领精神追求。从工具意义上说，精神家园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从价值理性上言，精神家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归所在。而追求修己安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该优势的发挥，可以和现代制度建设相得益彰。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现代化解决不了精神归属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把人心安顿好，就会与现代制度对国家的善治达到良性循环。

德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在国家治理上，法治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德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首先，德治优势的形成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性特点决定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被看作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仁者爱人”，人有恻隐之心，有道德责任和道德能力。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以这样一种德性思维观照世界，使世界富丽了德性的光辉，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配天地”“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其次，德治优

势的形成以中国历史上的治国实践为基础。中国悠久的道德本位主义传统，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推崇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中国德治实践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但德治、德教总是寄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缺乏一种制度上的制衡和保障，从而导致治理的低效和失效。最后，德治优势的发挥可以为现代法治建设注入德性的灵魂。传统的德治精神和德教措施，通过革新可以在官德、公德、私德等的提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法治具有德性灵魂，使现代人做到“有耻且格”“知行合一”。这才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

家国情怀与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相互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家族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成为政治秩序的基础，于是便形成一种移家为国、移孝为忠的家国同构治理模式。虽然在周代以后严格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但家国同构模式和文化却延续于漫长的传统社

会，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浓郁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中国人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家与国、个体与整体建立起唇齿相依的关系，构筑了中华文化中修齐治平、协和万邦的命运共同体精神。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其中最可贵的就在于一种不断超越的精神。正是这种超越精神，使得传统的家国情怀具有了突破家国局限、升华为世界意识的精神纽带；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了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当代价值；还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共识下，能够为人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中国方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业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现代化协力共进，日益焕发勃勃生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不断创新中为人类的现代化事业奉献大爱智慧。

大有笔潭